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谴责侵略者的残暴，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日本侵华罪证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从尘封的档案文献中，从苍老的亲历者坚定的叙述里，从研究者辛勤的耕耘中，日本侵华罪行的历史以更丰富、更精确、更具冲击力的面貌呈现于世。这些研究不仅是对过往侵略者暴行的再确认，更是关乎历史正义的深刻叩问、对人类和平的永恒坚守。

不断搜集整理的新史料，进一步固化日本侵华罪证史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日本政府有组织地大规模销毁了战时核心机密档案，导致战后侵华日军罪行追究和历史研究缺乏第一手核心档案文献。2015年，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近10年来，经过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搜集、深入挖掘，一批批尘封已久的侵华日军罪行原始档案重见天日，围绕战争加害者、受害者和见证者的口述史访谈方兴未艾。

海内外档案文献的不断挖掘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日军罪行证据来源。近几年来，学术界和国内各级档案馆推出了一系列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无差别轰炸、强制劳工等档案文献。2021年以来，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启动“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审判档案”项目，解密上线了370组档案文献，这是日本细菌战的核心史料，是全方位认知伯力审判、731部队关键问题的重要证据，以丰富的历史细节极大提升了有关伯力审判的整体认知。日本国内一些正义学者也不断挖掘、公布侵华

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日本侵华罪证研究的新进展及其价值

张连红

日军细菌战多项相关档案，如明治学院大学研究员松野诚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搜集公布了《陆军高等文官名簿》《陆军书记官·陆军技师》等一手档案资料，进一步揭示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内幕。一些日军士兵如木村中佐、西条荣策、新井淳等的日记相继公布，进一步佐证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和“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另外，侵华日军在华南发动“伪钞战”的档案也被公开，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伪造法币的数量、地点、过程、分赃流向、使用规定等内容。越来越多档案资料的挖掘，构建了侵略者罪证更为严密的证据链。

口述史作为档案文献的鲜活补充，具有独特的情感力量与细节价值。由于亲历者年事已高，抢救性采集工作刻不容缓。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研究机构及民间团体开展侵华日军暴行受害者口述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强掳劳工幸存者等群体的证言被系统记录、整理、核实并保存。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学者组织大学生开展乡村调查，相继出版了细菌战受害者、亲历者的系列口述资料，为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后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延续南京记忆会”创始人、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日本民间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小野贤二等则通过采访日本老兵，整理出版了南京大屠杀日本老兵的口述证言。近几年来，731部队原队员胡桃泽正邦、少年兵清水英男等口述证言资料，揭示了731部队进行人体解剖和人体实验以及实施细菌战等罪行。这些口述资料不仅记录了具体的受害者经历、暴行细节和地理环境，更承载了难以磨灭的情感创伤与生命体验，赋予冰冷档案以生命的温度。

网络平台数据库成为揭露日本侵略罪证的新平台。201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正式上线，平台文献囊括图书、报纸、期刊、档案、音频、图片、视频七大类资源，上线文献共计8300余万页高清图像和近1.8亿字著录文字，免费向全社会开放。在日本，

2001年开始设立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在通过互联网持续公布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从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有关亚洲的资料。中日两国这两大数据平台提供了大量涉及日本战争暴行的相关文献史料。另外，韩国《日军慰安妇记录史料数据库》收集整编8万多项“慰安妇”相关资料，供学界使用。网络平台汇聚的海量文献资料，大大拓宽了侵华日军罪行研究的路径。

跨学科融合研究，不断发掘认识侵华日军罪行的新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在侵华日军罪证研究中，学界不断搜集、丰富了第一手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但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历史结论，才能深刻揭露侵华日军罪行、还原历史真相。近几年来，日本侵华罪证研究已逐渐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融合研究趋向，特别是随着大数据应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视角深度融合，不断发掘认识侵华日军罪行的新维度。

历史学个案微观史与全球宏观史的深化，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的层次。微观史研究聚焦于具体地域、具体事件、具体群体甚至个体生命史。如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城郊汤山湖山村、西岗头村等遭日军屠戮村庄的深入考证，利用日军阵亡日记、地方志、族谱，特别是幸存者口述等多重证据，复原惨案发生的具体过程、村庄社会结构在暴力下的瓦解以及幸存者艰难的战后生存轨迹。这种“深描”式研究，使宏大叙事下的抽象数字回归为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揭示了战争暴力对最基层社会村庄的摧毁性打击。同时，全球史视角将日本侵华罪行置于更广阔的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主义体系、法西斯主义

全球蔓延的脉络中考量。研究者深入分析战争期间日本在朝鲜半岛、东南亚、太平洋地区侵略罪行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模式共性，还进行了德国纳粹大屠杀暴行和日本在远东大屠杀暴行的比较研究，这种视角打破了民族国家史观的局限，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独特性和共通性。

跨学科研究对日军暴行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法学（尤其是国际法、战争法）的介入，为判定侵华日军具体暴行的性质（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提供了严谨的法理分析框架。学者们运用法理细致剖析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无差别轰炸、使用生化武器等行为的违法性构成要素，探讨日本的国家责任与战犯个人责任的追究机制，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现实中对历史正义的诉求。社会学视角关注战争导致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家庭关系、代际性创伤等课题。通过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研究战争导致的难民潮、孤儿问题、性暴力遗留影响、战后社会信任危机等，揭示战争暴行如何持久影响社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社会心理。医学史、环境史等新兴领域也贡献了独特洞见。医学史研究聚焦731部队等日军生化部队，揭露其以“科学”和“医学进步”为名，进行活体解剖、细菌感染、冻伤实验、生化战等反人类暴行的本质。研究成果批判性地分析了战时日本科技如何被军国主义绑架，彻底背离了救死扶伤的医学伦理，沦为杀人机器。环境史视角则关注侵华战争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的系统性破坏：日军为军事目的所进行的细菌战对区域生态系统的长期毒害、遗留化学武器对土壤水源的持续污染，以及对森林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等。这些研究揭示了战争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灾难，也是生态环境的浩劫。

大数据的运用助力分析日军罪行研究新领域。有学者基于细菌战口述史资料，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和统计学工具对口述材料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地方志和文史资料实现多方参证，在时空分析的基础上，

还原了战时乡村历史场景，解析出战时民众流徙方向和目的地选择，构建了侵华日军活动与当地疾病流行的证据链。还有学者基于预训练模型对《拉贝日记》进行分句情感极性识别，并通过时序统计、地图映射和史料对照，从整体视角探索南京大屠杀前后拉贝的情感分布特征、变化趋势和对不同人物的情感倾向。研究表明，拉贝没有强化日军暴行的叙事意图，也没有明显的国族偏见等，反驳了日本右翼对第三方人士拉贝日记客观性的质疑。

守护历史真相，共筑人类和平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深入系统的日本侵华罪证研究，其意义远不止还原历史本身。它超越国界，关乎人类共同的良知与未来。今年5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指出：“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历史是照亮现实、启迪未来的明灯，承载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反击历史虚无主义逆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铁证如山的研究成果，是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系统性否定侵略历史、美化殖民统治、质疑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否认“慰安妇”制度强制性的最有力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受到了正义审判，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扎实的档案证据链、受害者具名具姓的证言、严

谨的学术论证，构成了无法撼动的历史堡垒。每一件新档案的发现、每一次研究的深化，都是对历史真相堡垒的加固，使任何企图歪曲、粉饰历史的言行在事实面前都无所遁形。这种捍卫，不仅是对死难者的告慰、对民族尊严的维护、对人类社会基本道德底线的坚守。

涵养民族精神，筑牢集体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人人抱定必死之心。成千上万的英雄们，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英勇就义，彰显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正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浩然正气，在民族存亡关头，迸发出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强大精神动力。对日本侵华罪证的深入研究，让那段浸透血泪的苦难抗争史更加清晰、深刻地融入民族血脉，化作集体记忆。它教育一代代国人，今日之和平与尊严，是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铸就的，是中华民族在深重苦难中不屈奋起的结果。这种基于确凿史实的记忆，能够有效激发中华儿女深沉而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一共同记忆，使中华民族因战争苦难而愈发顽强、因抗战胜利而愈发自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警示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筑和平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必须捍卫。”日本侵华罪证研究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它揭示了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强权政治的灾难性后果。侵华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反人类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创伤。对其根源、机制、后果的深入研究，为全人类提供了反思战争、珍惜和平的经典案例。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和平的阳光才再次普照大地。这份沉重的历史教训警示世人：和平犹如精琢玉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精心呵护；人权尊严不容以任何借口践踏；唯有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世界各国人民才能真正避免悲剧重演，从而携手共筑和平，推动构建关乎人类美好未来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

李明辅

充分调动起各方面积极性，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必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领导干部作为“头雁”，其先锋模范作用和带头示范作用绝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这里的“干”，是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实实在在地干，而不是装装样子，摆摆架子，虚头巴脑地“演”。然而，现实中也有个别领导干部干工作时拈轻怕重，面对困难不愿带头解决、面对风险不敢带头向前，遇到问题就把决策责任推给上级，嘴边常挂着“领导定了我才办”；出了事情就把责任推给下级，脱口而出“你们看着办”。按照这种想法做法干工作，不仅什么事都干不成，最终还会损害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领导干部如果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当官不愿干事，遇事就当“甩手掌柜”，有事就搞“击鼓传花”，那么肯定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把“带头干”作为落实责任之举，把“干事”作为修身立命之本，谨记领导需有力、组织要有方，无功便是过、平庸就是错，做到任务面前不摆手、困难面前不缩手、全力以赴不甩手、事不干成不撒手，才能形成一级带一级的优良干事创业氛围。

同时也应看到，“领头雁”并不是“全能雁”，“带头”不同于“包揽”。领导干部带头履尽职责，关键在于找准自身定位、明确职责边界，充分发挥引领、统筹与协调作用。既要树牢担当之志、改进领导之法、树好标杆榜样，激发人民群众的干劲与热情，又要合理授权，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成长成才，推动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协力加油干的局面。

这样，才能在身到心至的同时，避免陷入事务主义，切实把责任扛起来、把力量聚起来。



激发海洋经济创新动能

李志军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充分认识创新驱动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激发海洋经济创新动能，支撑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蓝色大海孕育无限机遇，海洋经济是未来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之一。开发蓝色碳汇、推动海洋能规模化商业应用、培育深远海旅游新业态、拓展智慧港口等新兴领域，无不依赖科技进步与创新。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努力突破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有助于牢牢把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

创新驱动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钥匙”。当前，保障海洋空间安全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近海渔业资源衰退、陆源污染加剧、生态空间挤压等问题日益严峻。只有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深远海智能养殖技术、研发海洋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装备、突破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瓶颈、构建海洋环境立体监测与生态修复体系等，才能破解资源约束与生态退化困局，开辟可持续的“蓝色粮仓”与“蓝色油田”，实现向海洋要空间、要效益、

要未来的转型发展。

创新驱动是锻造海洋产业竞争新优势

的核心动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向纵深发展，全球海洋科技与产业竞争日益激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把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抢占高端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的制高点。同时，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如推动“海洋牧场+”文旅融合、建设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等，将推动我国海洋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话语权与发展机遇。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积极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发展、取得重要进展，2024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在海洋科技创新方面，我们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蛟龙”探海、“雪龙”破冰、“海斗”深潜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涌现，海水养殖技术、海洋卫星观测、港口自动化等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海洋渔业、油气、船舶、工程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快数智化、高端化转型升级步伐。这些创新成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加速向深远海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

同时需要看到，我国海洋经济在创新驱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主要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强度仍显不足；创新体系初步建立，效能有待提升；科技成果

涌现，“卡脖子”痛点犹存；成果转化率低，产业化瓶颈多；人才结构失衡，高端人才紧缺；创新环境需优化，体制机制待突破；等等。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的要求落到实处，精准发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激发海洋经济创新动能。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牵引，围绕深海深渊探测与资源开发、智慧海洋等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布局，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负面清单+包容审慎监管”模式。二是攻坚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深海探测与作业技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海洋生物资源高值化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高效转换、智慧海洋技术等；加快建设深远海综合试验场、超大型海洋环境模拟设施、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库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三是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实施高端人才引育计划，在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上突出实际贡献；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涉海高校学科对接产业需求，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四是优化创新生态，引导和加大科技创新资源投入，鼓励设立市场化海洋产业投资基金和创投基金，发展海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蓝色债券等工具；加强海洋科普，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优化海洋人才发展环境，营造尊重知识、鼓励探索的氛围。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